

# 追念吳幹老師

● 邢慕寰（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自民國七十三年心疾復發，經醫師施行「繞道」手術失敗後，就一直靠高量藥物勉強維持，行動上也就受了許多限制，因此很少有機會拜訪時常想念的吳老師。

去年（七九）三月底，我的心臟又出現了不尋常的狀況，乃住進榮民總醫院就醫。兩日後，內人告以吳老師也住進同一層樓的病房，我立即偕內人去看吳幹（貞齋）老師。他仔細地把病情告訴我們，除了有些急躁以致吳師母服侍時更加辛苦以外，我看他的氣色正常，講話時仍中氣十足，心裡想：他一定沒有什麼大病，至少會活得比我長久。再隔兩天，他坐輪椅到我的病房聊天，精神特別好。我們談了很多話，後來偶然提到「費邊社」，我們一時都想不起Bernard Shaw之外一對夫妻檔發起人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的名字，不過我們還是談得非常愉快，同時我對他的健康也有更大的信心，我出院時，特別到他的病房告別，並且約定，等我的體力恢復後，將到他家裡去看他。

我回家以後，休養了好些時，也常常惦念著吳老師。有一天，我忽然記起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的名字，心裡很想立即打電話告訴他。但是我又想到他有些「耳背」，在電話裡可能聽不清楚，不如寫一封信，順便向他和吳師母請安。不料這一拖又是好些時。有一天，我忽然接到老學長楊必立的電話，才知道吳老師已經在榮民總醫院過世了！我當時感覺非常意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我和內人去參加吳老師的追思禮拜時，我才接受吳老師已經離開我們的事實。

前幾天，楊必立先生又有電話來，說吳師母想找一些學生各寫一篇紀念吳老師的文字，楊先生要我也寫一篇，我當時立刻就答應了。但是寫些什麼呢？我想了半天，才決定寫一段我親身經歷的故事，藉以彰顯吳老師主持中央大學經濟系時所秉持的基本信念與精神。

我是在民國二十七年考上中央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像其他同期或後期的同學一樣，一年級至重慶相溪分校就讀，二年後才遷往沙平壩校本部。相溪與沙平壩之間，約有二、三十里的行程，「通教」的老師來回都要坐「滑竿」（即由二人扛著的兩條竹竿緊夾竹製的坐椅），中途還要換船橫渡嘉陵江，所以每一趟都要花很多時間。吳老師是經濟系主任，為兼顧各年級學生的教學，自然也是採取「通教」的方式。他教的一年級課程，是替學生奠定基礎的「經濟原理」。因為他來去匆匆，我們學生同他簡直沒有課外接觸的機會。我對他的初步印象是，身不高而壯健，雙目炯炯有神，講起書來聲如洪鐘。不久，聽說他做官去了，但仍保留中大經濟系主任的職位，不過一年級的「經濟原理」改由另一位教授擔任。據說這位教授曾在美國深造八年，曾獲兩所名校的雙料博士學位。但是，是不是因為我們不習慣他的廣東國語，或是因為我們的程度太淺，不能接受他的教誨，

還是因為他和我們之間缺乏適當的溝通，我們這一班同學都覺得從他教的「經濟原理」根本得不到什麼益處。這樣，全班同學便一致決議（那時我們還是只有十餘人的小班）向系當局要求更換教授。吳老師知道事態嚴重，曾親自到柏溪進行「疏導」。我因為身高的關係，被同學們選的「談判」代表。

事先約定，在吳老師召集我們「疏導」時，由我首先「發難」，再由同學們「接應」，最後由我綜合同學們的意見向吳老師「攤牌」。也許我最後講的幾句話沒有分寸，惹得吳老師怒目圓睜，以致不歡而散。當時同學們都覺得，我們的要求大概沒有希望了。可是幾天以後，我們得到意外的驚喜，原來我們向吳老師提出的更換教授的要求居然被接受了。

這一件事，使我們這一班學生對老師多了一層了解；他並不是一位因為臨時從政而輕於放棄責任的系主任，他更不是一位看起來像是「家長式」的權威系主任，他寧願得罪原來替他代課的朋友，而以學生的課業為首要，所以他實在是一位開明的，對學生真正關心的系主任。單想這一件事，吳老師就贏得了我們的尊敬。

其實，這個小故事只不過是吳老師主持中大經濟系所秉持的一貫信念與精神的實例之一。這個一貫信念與精神，就是：排除萬難，不斷提升教學水準。照一般人的了解，當時的中央大學即是全國參加聯考學生的主要競爭目標，而又位於高等教育人才薈萃的戰時首都所在的重慶，應該很容易羅致最優秀的學者參加教學，因而中央大學各院系似乎不必擔心教學水準問題。但是他們不知道那時大學教授的生活是多麼艱苦，而政府對他們可能提供的專職或兼職又是多麼誘惑。在這種情形之下，位於戰時首都的中央大學不但在羅致教學人才方面佔不到便宜，反而有流失原有教學人才的危險。

就中大經濟系而言，資深教授朱俊（講授財政學）首先被財政部拉去擔任專賣事業司司長，而接替朱俊講授財政學的甯嘉風後來也被資源委員會拉去擔任人事處處長。在另一方面，經濟系學生的人數却大量增加，我們那一班（三〇級）一年級新生只有十八人，下一班（三一級）就擴大到四十人，再下一班（三二級）更擴大到八十人。任何一個負責的系主任碰到這樣的局面，恐怕都不知道如何應付，更談不上提升教學水準。可是這一個似乎不可及的目標，吳老師却輕易的達到了。

其實，他並沒有什麼巧妙的秘訣，他所做的只不過是敞開心胸，不拘門派（雖然他自己曾被定位為清華派），親自到鄰近中大的南開經濟研究所一拜訪當時頗享盛名的幾位教授——包括方顯廷、李卓敏、吳大業、陳振漢等，當面請他們到中大經濟系兼課；另外，用同一方式被邀到經濟系兼課的教授，還有當時擔任國民黨政委會委員的周德偉（原任湖南大學經濟系主任）和剛從英國求學回國的羅志予。最會令人驚訝的，是他居然敢於延聘自認為是「馬克斯主義者而非共產黨徒」的樊弘（原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員，後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為專任教授。這些新人的延聘，不但加強了中大經濟系的教授陣容，而且擴寬了學生們選課的自由空間，因而教學水準不待鼓吹而自行提升。而更重要的，是各家學說紛陳，施教者和受教者都不受拘束。

這個教學方式的效果，一時雖然看不出來，但是以後中大經濟系的同學都能各自擇善固執，而不盲從附和，確與他們在這一段時間所受的教育方式有密切關係。這個成果，自然應該完全歸功於吳老師的領導。

在表面上看來，這件事似乎不足為奇。但是當我在多年前看到報紙上報導臺灣某大學經商各系學生「有志一同」贊成保護政策而排斥自由主義的調查報告時，立即想到對他們灌輸這個「一言堂」思想的教授們必定是一批經濟干涉主義者。我不知道這些教授以及受過他們薰陶以後加入政府工作的學生對多年來政府實行的經濟干涉政策有無實際影響，但是由此也再度證明凱因斯所強調的「既定觀念」相對於「既得利益」的危險性。

我很後悔，去年三、四月間吳老師和我因病而有機會在榮民總醫院的病房會晤時，我沒有提及以上敘述的一些往事，否則他大概也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吧。可是現在追悔已經來不及了！